

導讀日期：2011.9.3

導讀文章：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 Scholar (1998). Textbook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war: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30 (2).

導讀人：李涵鈺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BCAS) ，於 2001 年改名為 *Critical Asian Studies* (CAS) ，peer-reviewed 的學術季刊，專收錄亞太地區的相關論文、評論、翻譯、訪談等，特別是能夠挑戰過去了解亞太地區既有模式的文章。

期刊網址：<http://criticalasianstudies.org/>

主題：教科書國家主義、公民素養與戰爭：比較觀點

### **Introduction**

Laura Hein and Mark Selden - Learning Citizenship from the Past: Textbook Nationalism, Global Context, and Social Change

### **Four Dimensions of the Current debate over Textbooks in Japan**

- 1.Gavan McCormack - The Japanese Movement to “Correct” History
- 2.Nakamura Masanori - Th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 Nationalism
- 3.Aaron Gerow - Consuming Asia, Consuming Japan: The New Neonational Revisionism in Japan
- 4.Inokuchi Hiromitsu and Nozaki Yoshiko - Japanese Education, Nationalism, and Ienaga Saburo’s Court Challenges

### **Problems of Strategy**

5. Kimijima Kazuhiko - The Japan-South Korea Joint Study Group on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Continuing 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 **International Contexts**

6. Yasemin Nuhoglu Soysal-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ization in German School Textbooks
7. Combining ethnic heritage and national unity: A paradox of Nuosu (Yi) language textbooks in China  
分析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教材的問題。
8. War crimes and the Vietnamese people: American representations and silences.  
研究越戰的美國學者調查南、北越的教科書內容。

Hein, L., & Selden, M.(2000).Censoring history: Citizenship and memory in Japa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M. E. Sharpe.

## 導論：Learning citizenship from the past: Textbook nationalism, global context, and social change.

by Laura Hein 美國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

Mark Selden 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歷史與社會學榮譽教授，現為康乃爾大學東亞計畫的資深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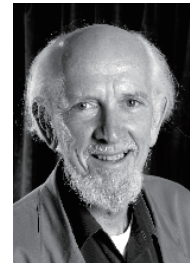
在導論，兩位編者將這些文章置於廣闊的視野，首先，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國的變化會對國家論述帶來新的挑戰。如果這些論述無法符合未來的想像，國際爭議事件就可能發生，如戰爭敘事經常成了國際新聞。其次，國內社會變遷迫使國家歷史中的各種故事將被重新審視，如過去從屬的群體開始要求納入他們的觀點，而這將會顛覆過去的故事。

這也意味國家的各式敘事，一直是未完成的計畫，需要修改和重新解釋。這種重新解釋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也往往具爭議。日本的經驗，特別是清楚地說明社會必須反覆重新評估做法（及評估教科書）。教科書是日本論爭的核心超過五十多年了，理解這些爭論仍然至關重要。

對過去行動不斷重新詮釋，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想像與其他國家的聯繫。第二個涉及公民和國家間的關係，在公民權利不斷增長的需求背景下的管理問題。各國政府不得不重新評估過去的行為，不斷整合社會變革。最後，各國政府必須考慮到其他族群和國家的意見，民族主義，公民，區域、全球合作、和社會變革的角力是日本與世界所有國家面臨的問題。其中教科書是處於戰鬥前線。

### 1. 篇名：日本修正歷史的運動(The Japanese movement to “correct” history)

By Gavan McCormack，國立澳洲大學亞太學院教授



自由主義史觀及「修正歷史」

隨著戰爭記憶逐漸變淡，有關戰爭的責任問題是半世紀前逐漸壓迫日本，自 90 年代起，許多慰安婦、南京大屠殺、戰時強迫勞工計畫與 731 部隊細菌化學實驗等日本殖民與侵略時期受害者的數十起訴訟案，紛紛向東京法院提出日本必須道歉與賠償的要求，其中又以慰安婦事件較為棘手。

日本國內，在幾十年官方層級的延宕，但許多組織層級的努力下，1990 年代官方層級開始處理這些問題。1993 年自民黨 (LDP) 結束一黨獨大的專政體制後，日本官方才正式承認殖民與侵略行為，直到 1995 年日本國會通過決議案才真對當時的惡行正式表達道歉，官方承認為日本兵成立和管理「慰安所」並承認許多婦女是受迫的。在官方支持的民間基金會成立後，第一次慰安婦補償與首相的道歉信於 1996 年正式執行與發出。

然而這卻激起激烈的對立意見，自民黨在日本國會中仍堅持當時戰爭的正當性，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道歉。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 (Fujioka Nobukatsu) 分

別於 1995 與 1996 年成立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與「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藤岡的論點是對於日本失去自己的歷史意識感到惋惜，應該要擺脫曾侵略他國的罪惡意識，逐漸轉向強調做為日本人的榮耀的道德使命。強烈認為應刪除 1997 年 4 月通過的教科書中「強迫挾持慰安婦」的描述及南京大屠殺等其他描述。認為納入這些到教科書文本中，會失去自己（our own）的歷史感。

支持藤岡認為他有些觀點是對的，因為許多人厭倦 50 年前的僵局到現在還沒有解決，也不想再討論半世紀前事件的責任歸屬與賠償。這些人希望能夠在全球經濟強國中尋找到日本的正面身分認同和角色。

作者認為藤岡借用自由（liberal）的概念進行闡述，但是其目標與傳統國族主義者並無不同。自由主義需要高度客觀、發展相對性與多重因果架構等，但藤岡等人實際上卻沒有兌現過。

### 慰安婦的挑戰

因為慰安婦事件無法提高「以自己國家歷史為榮」，因此不應該被說出來。他宣稱慰安婦事件是錯誤的指控，以及認為教科書中任何反日與受虐行為的內容會腐蝕、摧毀並分裂日本，學校教慰安婦的「錯誤的歷史」，亦造成反日本的意識型態。藤岡與同僚支持的觀點—否定慰安婦、否定南京事件、否定與 731 部隊相關的暴行，作者認為應如同德法的例子，立法禁止拒絕否認大屠殺。

### 人與運動

1943 年出生的 Fujioka，名字 Nobukatsu 字面上的意思是「相信勝利」，當時的日本在戰爭中處於弱勢的一方。年少時，他相信左翼的「國家和平主義」思想。先在北海道大學，專長教育教學和方法論，80 年代前期他到東京大學，直到 1992 年從美國羅格斯大學一年歸國後開始聲名大噪，在羅格斯大學修習文化人類學，當時他對於日本政府回應波灣戰爭的態度感到羞恥，也受到閱讀書籍很大的影響，如閱讀 Michael Walzer 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和 Richard Minar 的「勝利者的正義」，他認為日本缺乏保衛國家安全的意志，並將大東亞戰爭視為正義之戰，而戰後日本和平憲法阻礙日本發展自己的國家主義思潮。

藤岡指稱的左右翼對立是很普遍的一般歷史模式，其特別之處在，他以「自由主義」超越左右對立的僵局。但他的歷史觀沒有新自由觀點，仍是傳統歷史的帝國觀點。藤岡等人的新自由主義的「知識」（intellectual）基礎，傳遍各省及大街小巷的同時，卻看不到自由，反而帶來類似戰前與戰後右翼與極端愛國主義團體的威脅或暴力。雖然藤岡等人利用媒體宣傳理念和主張，及政治力量向教育部施壓，但宣傳結果卻不盡理想。只有零星幾個縣市有回應。

### 朝向理解與詮釋

藤岡過去幾年帶起的運動牢牢地深植於戰後日本的國家主義，依後冷戰時期情勢的改變與日本崛起成為經濟強國等狀況進行修正與重塑。藤岡那一代的人大

都對於日本的無能展現國力與形象感到丟臉，日本始終活在過去歷史的陰影下，也為受其他國家控制延伸出的道歉外交感到羞恥，也不滿必須看美國臉色做事，這樣的怨恨可以視為一種受害者情結，藤岡運動運用了這樣的怨恨，召喚建立一個驕傲、乾淨、榮譽的歷史，因此，慰安婦的指控越嚴重，日本的光榮就越容易消逝。

這些現象的議題在日本引起評論家與學者的關注。歷史學家 Nakamura Masanori 認為藤岡現象在現代歷史中是在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間的擺盪。而政治學家 Ishida Takeshi 將這樣的現象視為日本知識份子的危機，儘管他也支持自由史觀，但他認為應該超越戰後的觀點，跳脫美日雙方關係的角度，加入其他亞洲國家的立場，尤其是從社會的弱勢、受害者的觀點，和那些受到忽視。

### 結論

冷戰後日本表現出強烈欲望，想要構連日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認同，有意義的整合人民的忠誠和世界面向，這是無須憂慮的，這是欲望是普遍性的。但作者感到擔憂的是他所敦促日本政府政策，如果通過的話，日本與亞洲鄰國的和解過程將會倒退，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被合理化為各種反自由與反理性的模式。

## 2. 篇名：歷史教科書的爭議與國族主義 (Th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 nationalism)

by Nakamura Masanori 一橋大學名譽教授，專長為日本現代史

Translated by Kristine Dennehy 紐約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



在過去的幾年裡，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聲音要求修改近代和當代日本歷史教育。批評者認為，國中和高中歷史教科書誹謗日本和呈現陰沉，這種「自虐史觀」的教育，使日本兒童無法對國家的歷史感到自豪的，也無法培養良好的民族主義觀。為什麼有這樣的說法出現？有很多原因，但作者認為基本的原因是希望增強日本的身分認同。

作者從「回歸日本」的現象來說明，從明治時期（1868-1912）開始，有每三十年左右為一個週期，呼籲關注最近的回歸日本現象，第一波在1890至1900年明治初期回應文明與啟蒙運動的地方化和民族主義。第二波在大正末期（1912-1926）和昭和初期（1926-1989）回應了世界主義和民主情緒。

第三波的回歸日本運動興起於1950到60年代，反對國際主義和美國主義。這四波「回歸日本」的共同現象是一種對傳統的重新評估，相信日本種族優越性，並振興日本國家角色的需要。

在某些方面，現代日本民族主義的週期就像是一個鐘擺法則。我相信在數年後事情會冷靜下來，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不能忽視這個目前的趨勢。特別是，

這些最近的趨勢已經開始在初中和高中學生歷史教育發揮巨大的影響力。今日的「回歸日本」有什麼不同點？第一，社會主義的崩潰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衰退。許多戰後初期歷史學家還會指責以天皇為中心的歷史觀點，促發亞太戰爭。然而現在這個假設受到質疑。（這四波浪潮也越捲越大，隨著戰時人口的凋零後一代的人對這些事件也會越來越沒熱情）

其次，不僅是今天的學生是戰爭無知的一代。他們所知道的是一個生活豐足，且他們認為日本是一個很好的國家。即使在一陣經濟泡沫，學生仍然認為，日本比其他國家富裕。且初中和高中教師之中亦有一個世代轉替，大多數是出生在經濟增長後的時期和不曾經驗過戰爭和戰後的貧困。

三，戰後日本的歷史被稱為美國化的歷史，近年來，日本對此充滿怨恨。

作者認為要瞭解回歸日本的現象必須分析日本人民民族情緒的變化及他們對日本歷史的假設。

### 自由史觀研究會

藤岡的《可恥的現代史》這本書中，藤岡說，「當前歷史教科書充滿了一種自我折磨和反抗日本的史觀」，但是這是一個扭曲的，片面的斷言。由於「慰安婦」的描述，於1997年4月同時出現在所有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使用，藤岡不滿，並會見教育部長，以及請願慰安婦從課本移除。一旦教科書已被授權，從來是不可能刪除，所以不如預期，請願被拒絕其理由是該描述是準確的。如果教育部接受藤岡的要求，就不會是國內的抗議風暴，可能會升級為一個國際問題。

從現存公開的文件，證明日軍參與了慰安婦的召集，運輸和活動，與慰安婦的證詞一致。但「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成立於1996年12月，以藤岡和西尾(Fujioka and Nishio Kanji)為代表，無視這一點，他們生產的教科書，沒有一行有提到慰安婦，也不想寫有關南京大屠殺和731部隊。此外，藤岡認為，大東亞戰爭是部分原因是戰爭的自衛，並且它幫助從西方帝國主義解放亞洲。作者認為這樣的自由史觀研究會其實已經變成了民族主義研究會。

大東亞戰爭的戰略計劃是為了取得油而需要繼續在中國的戰爭。其目的是為了控制婆羅洲的石油領域和蘇門達臘島。雖然其意圖並非在領土，日本仍對許多其他民族引起極大的傷害，並進行了戰爭侵略。有人說，戰爭是戰後時期，東南亞國家獨立的催化劑，如果日本確實有這種良性計劃解放殖民地的土地，那麼他們將先解放對韓國和台灣的殖民。

### 走向建設一個國家新願景

雖然世界各國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強了，我不認為這種趨勢將持續增長，是世界主義年代與極端民族主義年代的交替輪流。然而，這不是必然的，不像自然的法則。徹底批評是必要，以防止極端民族主義上升。在1960年代，當林房雄(Hayashi Fusao)提出了「肯定大東亞戰爭理論」，許多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聯手抗議，這個批評的影響力量持續了好幾年。但即便如此，如果沒有任

何組織性的反擊，他的理論將有更持久影響。這同樣適用於這個「第四波回歸日本」。

歷史學家和教師在这一切是扮演什麼角色？必須面對歷史的事實，和對學生公開溝通過去的成功與失敗。失敗本身並不恥辱。相反，可恥的是不研究過去的失敗或偽造歪曲日本人民歷史意識。

### 3.篇名：消費亞洲、消費日本：日本的新國家修正主義（Consuming Asia, consuming Japan: The new neonationalist revisionism in Japan）

by Aaron Gerow 耶魯大學電影研究及東亞語言與文學教授



#### 歷史與國家鬧劇

作者看過藤岡的著作《教科書中沒教的歷史》後發現，那是一本以自我感覺良好的敘事，描述現代日本歷史中偉大的男人與女人。藤岡在書中表示日本現有的教科書是在唱衰日本（bad-mouth Japan），依著其他國家的利益鼓吹自虐歷史。藤岡認為歷史教育應該讓日本再一次為自己感到驕傲。

該書書帶（book band）上的兩段說明——我們並不了解這個國家。78個我們應該牢記的故事。兩段日文原句缺少明確的主詞，因此可以同時指涉讀者及作者，作者利用語言的灰色地帶，使讀者與作者共同再建構國家主體意識。本書的書腰巧妙的利用語言召喚共有的／國家的情緒。

封面的黑白照片與紅色外框更有助於喚起國家共同體。封面照片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女孩背著嬰孩，代表著貧窮卻工作努力的日本女人，雖然故事不如偉人般精彩，但卻深植於日本人心中。



然而，配合封面的書名，這張照片不僅僅想喚起純真（innocence）而已。有人認為日本人的純真是因為近代戰爭史而漸漸消失，但藤岡認為是目前歷史教學與歷史敘述以及當權者應該付起責任。

藤岡在書中以母親（hahamono）為受害者的敘述方式建立讀本的架構。讀本架構都如電影敘事般希望博取幾滴眼淚或激起讀者情緒。因此這本書並非單純喚起讀者身為日本人的驕傲，戳破教科書的禁忌所造成的影響才是真正的目的。

《教科書中沒教的歷史》因為帶有史實的評價，內容充滿為受害者與鬧劇敘事，也因為它帶有特定目的以及神話般的模式，因此它最多只能當作是文化的、論述的甚至是文學的文本，介於歷史與小說之間。這樣可看清新教科書的修正主義如何運作論述架構，以及它如何透過消費者對現代歷史形勢的欲望創造需求。

#### 冷戰後國家的威脅

儘管藤岡將美國視為是壓迫者，但卻避免批評美國與美日安全條約，反而將焦點放在亞洲國家可能帶來的潛在威脅。除了面對外國的威脅，日本內部威脅與分化也是問題之一。因為亞洲各國施壓，日本教科書漸轉向著重日本的黑暗面，特別是在1993年自民黨暫時失勢之後，情況更為嚴重。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正

是在這種情勢下成立，希望避免任何危及日本優勢的改變發生。而現在自民黨又再度成為執政黨，藤岡現象可視為是非自民黨政府下台後重回正軌的一個要素。

對於許多日本人而言，特別是藤岡，波灣戰爭暴露出日本只會到處灑錢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肯認，這個羞辱再加上面對同盟國慶祝二次世界大戰 50 周年勝利，種種因素使日本儘管是經濟強國，仍無法在國際政治上贏得尊嚴與自我認同。藤岡的書正是在強調因為日本人不斷貶低自己，在其他國家抬不起頭，而為自己是日本人感到羞愧。

教科書的爭論也影響著青少年族群。日本年輕人不如 60 和 70 年代的前人展現政治狂熱，媒體圈與教育界都認為他們的冷漠以及不了解後設論述嚴重影響日本的未來。

新教科書研究會不能只是理解為歷史受國家主義者管制，藤岡某種程度上試圖保護課堂不受歷史研究侵蝕，將教育從史學（historiography）中分開。所以有些追隨者雖然並不否認將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視為侵略，但他們仍支持藤岡的想法，因為他們認為儘管是事實，但不意指必須將這部分以國定教育的方式教給兒童。因為藤岡是東京大學的教育學教授不是歷史學家，以及自由史觀研究會的成員大多是老師，因此這個教科書運動必須視為教育議題。歷史學家可以堅持自己的專業，但學校最終還是必須教育學生成為日本公民，而不是讓學生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感到質疑或羞恥的。不難看出這與戰前教育系統的想法類似。

另一個迷思是日本人論（nihonjinron），也就是關於日本民族組成的意識型態，用來定義國家主體。在日本人的論述之下，藤岡常使用「我們」，也就是因為我們是日本人，所以我們自然從自己與國家利益的立場發聲。這種「自然」邏輯的意識型態，不僅定義日本人的本質，也說明如果要成為日本人則必須擁有某些特質。這樣定義不僅忽略那些住在日本但種族上非日本的人，更排除那些不認同的人。藤岡宣稱自由的旨趣會考慮其他國家的想法，但它對於教育與歷史的觀點實為透過消滅他者的威脅，重新凝聚國家主體，為創造健全的國家主義，因此這些受傷的慰安婦必須再一次被污名化然後遺忘。作者認為如果這稱得上是國際主義，這應該是極度自我為中心的國際主義。

### 亞洲和國家的消費

藤岡和自由史學研究小組必須從一個被消費的產品來分析。作者認為，自我包裝值得注意：大多數成員採取撇清舊時代右派主張大東亞戰爭的光榮，許多人承認日本犯下的暴行。他們稱自己為「自由派」，宣稱希望是一個「健康的民族主義」。這是後冷戰的運動及建立統治意識形態的理想幻滅；因此，在媒體行銷上一掃舊的思想包袱，重建無負擔的國家。右傾的敘事已在各家廣播和電視司空見慣，大量曝光量，形成消費文化，如果教科書修正主義構成了威脅，那有一部份是有關日本的神話和敘述，正在每天消費。藤岡的研究會呈現的是消費主義式的國家主義。

最後作者以 1996 年岩井俊二導演的流行電影「燕尾蝶」來說明。作者認為，第一，當代日本年輕世代的文化是模糊的，二是消費主義的國家主義能結合這些看來自相矛盾的立場，其本質是包羅萬象的。岩井的消費亞洲可看作是藤岡的消費日本歷史，兩者都將日本和他者變為可以重新洗牌，甚至重建一個神話般日本的圖像和敘事。電影和藤岡的書共同的努力是在後現代消費文化中抹去他者與重建國家。

#### 4. 篇名：日本的教育、國家主義和家永三郎訴訟的挑戰 (Japanese education, nationalism, and Ienaga Saburo's court challenges)

by Hiromitsu Inokuchi (日本東亞大學社會學)

Yoshiko Nozaki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 教育研究所)



在 1985 年 8 月 15 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鈴木內閣總辭。即將卸任的教育部長太田耕造 (Ota Kozo)，在那天發表了最後對學校的指示，他認為，日本戰敗是由於人們奉獻給天皇不足，再加上未能充分發揮其帝國精神培育的教育，因此學生和教師應該完全投身到自己作為皇民的職責，並維護國體。太田，就像許多官員一樣，在戰爭中宣傳極端民族主義與以天皇為中心的教育，甚至在戰爭失敗後，也堅持確保帝制國家。

教育是宣傳國家敘事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並用以建立與重建某種國家認同。可以肯定的是，在二次大戰前甚至是在二次大戰期間，當時的官方敘事如教育敕語 (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 與其他美化的軍事故事 (fine militarist stories)，對形成日本人身份認同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在戰前，通常暴力、壓迫與反敘事是無法更改國家課程的方向。在戰後時代，教育成為各方社會力量 (social forces) 鬥爭的舞台。家永三郎成為過去 50 年來，反敘事與認同的政治鬥爭中，至關重要的人物。

日本投降後，美國官員試圖改造日本為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的國家。1945 年 9 月 20 日，教育部下令刪除學校教科書中軍國主義的內容和教材，這就是所謂的墨塗 (blacking-out) 教科書，只要字面上涉及美化軍國主義的內容都要塗黑，並給了幾個標準，沒有指定精確的段落都變黑了。但是將慶祝帝國主義與道德的段落原封不動保留。由於教育部模糊不清的指引，結果，被塗黑的教科書中沒有兩本是一模一樣的，某種程度上來說，在每個教室裡發生了不同的國家敘事的意義。

在 10 月，同盟國最高統帥 (th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Powers, SCAP) 指出了幾個課程內容與教科書有關的方向。10 月 22 日，SCAP 下令從學校中剷除軍國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教材內容。12 月 15 日，也非正式地提出改寫日本歷史教科書。最後，在 12 月 31 日，下令暫停道德、日本史、地理的教學。

繼 SCAP 在 12 月 31 日下的命令，一些歷史學者，包括家永三郎，開始提出戰後日本史教育、教科書書寫與出版。事實上，家永是一位歷史學家，也曾是一位中學與師範學校的老師，在 1947 年時，出版《新日本史》反映了他的觀點，



即教育應根據核實的事實，且應傳達民主的價值觀與對和平的渴望。之後的訴訟也是這本《新日本史》的修訂版。

#### 1947年憲法、教育基本法和國家撰寫教科書的失敗

在1946晚期與1947年初，教育決策的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因為新憲法在1946年公布，提供了不同於投降前強調帝國國家的極端民族主義，強調主權屬於人民，保障基本人權與放棄戰爭。同時，「新教育」形成了，因為憲法保障學術自由與人民選擇教育的權利。在1947年3月31日，《教育基本法》與《學校教育法》立法。

《教育基本法》闡述戰後教育的原則，包括以教育做為「全人格的發展」的目標、規定「教育機會均等」與「男女合校」。最重要的，它指出「教育不應受不適當的控制，但應由全體人民直接負責」。《學校教育法》，涉及學校的實際運作，規定中小學教科書要由主管當局進行篩選，批准或撰寫。中小學必須使用文部省審定通過或是文部省著作的教科用圖書。

#### 家永三郎的三次訴訟

1952年家永三郎應三省堂出版社委託，編寫高中歷史教科書，他提出《新日本史》修訂案給文部省。當時被拒絕，五個審查者中其中一位給了極壞的評價，家永原封不動重新提交，結果換另一批審查者，它被批准和公佈（在1953年）。

1955年家永的教科書改訂審查，雖然通過，但修改了216處，隨後幾年文部省屢次提出修改要求，家永也一一修訂。同時，他也覺得教科書審定違反憲法和教育基本法的理念，如保障自由表達、保障學問自由。

在1965年家永提出第一次教科書訴訟。獲得許多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日本教師聯盟、出版工作者協會，以及個別教師，學者和出版商員工。

雖然他要求國家賠償在審定過程中對作者的精神上的傷害，家永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國家審查教科書是違憲的，違反了基本教育法。因此，他需要在訴訟中證明，文部省濫用權力要求修訂。有些部分是有關描寫日本最近戰爭（即十五年戰爭與中國，韓國，美國和其他國家）。家永曾表示，「大多數[日]公民沒有告知真相的戰爭，所以只能踴躍支持魯莽的戰爭」。文部省認為戰爭以「魯莽」來描述，過於價值判斷，另外認為插圖太多戰爭的陰暗面要求刪除。

1967年家永企圖恢復幾個說法，再度提《新日本史》，沒有通過審定。1967年，家永不妥協，對文部省提交行政訴訟，要求撤銷不合格審定且不符教育基本法理念。

每次訴訟都要經過東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各次的判決都不太相同，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訴訟，審判長是杉本良吉，認為人民有教育的權利和自由，認為文部省違憲，家永的勝訴鼓舞了其他作者，教科書對於日本入侵中國、日本對韓國的殖民政治等有較詳細的描述，高等法院二審也是家永勝訴，文部省不服，再上訴最高法院，在70年代後期，日本政府和自民黨試圖重新控制教育，特別是強調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課程，審查也越來越嚴厲。1982年教科書

審定時，許多教科書談到侵略時，都被提出修改指示，要求作者將侵略改為進出等淡化日本戰時侵略的亞洲國家，引起中國、韓國等國的抗議，最後日本政府接受亞洲鄰國的批評諾糾正教科書的描述。而文部省隨後宣布一項新規定，在論述亞洲國家相關歷史時，必須從國際友誼與合作的角度加以考量。當時，日本政府單方面認為爭議解決，但文部省並沒有改變對教科書的民族主義傾向。

1983 年家永的審定雖通過，但有 70 處被提出修改，1984 年提出第三次訴訟。這次的修正要求包括軍隊對婦女的暴行是戰時常見，不僅限於日本軍，731 部隊以活體進行實驗並加以殺害，目前還沒有研究證實，應予刪除等。第三次訴訟的結果 1993 年和 1997 年均是部分勝訴，在 731 部隊和對婦女的暴行，判定審定意見超過權限，是違法的。

結論：家永教科書訴訟的意義

戰後，日本的國家敘述和認同建構，家永訴訟一直是一股對抗的力量。

1945 年，在東京戰爭法庭，美國免除起訴許多日本戰爭犯罪的責任，特別是天皇。最近日本在自民黨控制之下，忽略戰爭責任問題，包括殖民統治的責任問題，和也忽略曾受其侵害的亞洲人聲音。

家永是極少數的學者之一，透過司法機制，追求戰爭罪行和責任的問題，還原歷史的事實。他的獨特性在於：

1、透過他所提出的教科書訴訟，凸顯了教科書審定制度存在的問題，讓帝國、極端民族主義的操作顯露出來。

2、激起公共興趣及對戰時日本進行研究。如 1970 年的勝利造成的直接影響，使其他教科書的作者有勇氣記錄日本的戰爭暴行。家永他在第三次訴訟的局部勝利（也許反映，國際形勢的改變迫使日本聽取受害者的聲音），讓許多日本人至少就戰爭和殖民主義未決的議題，開始聽亞洲的聲音鋪路。

3、挑戰國家權威：誰的知識可以在教科書中呈現。訴訟過程挑戰了：誰能決定教育的內容和依據什麼來決定？作者認為，重要的是要發展民主進程，通過這些教育內容可以進行辯論、協商和選擇。教科書的生產需透過自由和共同參與的過程中創造意義和價值。國家的適當角色是確保公平的過程。不應該由社會的主導和強勢群體決定哪些知識將代表學校課程。

### 5 篇名：日韓共同教科書研究會中的歷史教科書及日本殖民主義的遺緒 (The Japan-South Korea joint study group on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continuing legac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by 君島和彥 Kimijima Kazuhiko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近代日本史教授

Translated by Inokuchi Hiromitsu 日本東亞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1994 年中期開始，日本的歷史再詮釋和歷史教科書運動獲得了動力，由日本東京大學的藤岡信勝教授所領導，進行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修訂」(revision)

運動。基於盲目愛國的民族主義，藤岡的「歷史修正運動」從傳統的右翼知識份子和政治力量獲得廣大的支持，即使它仍只是在發展中。

藤岡及相關學者認為無法從日本與南韓共同歷史教科書研究團隊的成果學到任何東西，但作者認為仍有價值之處，也說明了要達到歷史共識的困難。

### 研究團隊的起源

1990年，南韓學者 Yi Tae-yong 在參觀德國，及閱讀藤澤（Fujisawa Houei）的「德國的歷史覺醒：在教科書中的呈現戰爭責任」，Yi 向藤澤（日本金澤大學教授）提議，日本和南韓基於德波發展教科書交流模式能共同研究。Yi Tae-yong 現為韓國國際教科書機構的所長。

最初，共同研究團隊的目的是合作檢視在日本和南韓的歷史教科書，關注在現代史的觀點描述。然而，後來逐漸發展為，檢視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現代史呈現。因為，思索侵略者如何描述自己的侵略更為重要。

一開始，這個團隊有 30 位參與者，包括日本和韓國的現代史學者、歷史教育和教育學者、高中和中學教師、教科書出版社的編輯人員和研究生。（這個研究團隊沒有受到日本或韓國的補助）。

作者是日方共同團隊策劃的代表之一，在國際會議上，報告過日本教科書系統和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對日韓歷史的描述。首次共同會期之前，日方參與者已經展開每月一次的研究會議，韓國的參與者有與會幾次。國際上日-韓研究團隊會議總共舉行 4 次，每個國家兩次，從 1991 年春到 1992 秋。在國際會議上的討論吸引了上百人，探討歷史爭議，不限於教科書中的描述。

### 韓國學者提出的議題

研究團隊會議中所提出的眾多議題，作者特別討論與日本和韓國歷史關係的「概念化」相關問題。如「征服韓國的理念」的觀點：在第二個國際研究團隊會議上，日本歷史學家加藤晃（Kato Akira）（上越教育大學）提到 1873 年討論了日本是否攻擊朝鮮的論辯。在那次辯論中，幾位新明治政府領導人，包括主張「征服朝鮮的思想」，韓國研究員易玄熙（Songsin 女子大學）反擊加藤的立場，揭露明治即有征服韓國的歷史根源，甚至早於明治時期。

### 15年戰爭的觀點（1931-1945）

關於與日本和韓國戰爭的討論，集中在「戰爭」範圍的分歧和建立「戰爭責任」。日本進步史學家概念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為「十五年戰爭」（在一些學校課本也用此術語）。「戰爭」被視為始於 1931 年 9 月日本侵略的中國（滿洲）的東北部的一系列戰爭，和終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相比之下，一些保守的日本，想要掩蓋日本入侵中國和東南亞，認為這十五年的歷史就好像它是一系列獨立不相關的事件：日本 1931 年先進入中國東北（和衝突結束），日本在 1937 年進入中國（和衝突解決），以及 1941 年 12 月日本加入戰爭對抗美國和英國（這

場戰爭於1945年「結束」)。這個框架有助於隱藏戰爭的本質：是始於日本的侵略。總之，日本較進步的史學家認為十五年戰爭的一系列戰爭，提供一個更全面的了解歷史，也考慮到考慮戰爭責任的問題。

然而研究團隊中的韓國學者，提出一系列精闢的問題：日本人所謂的「十五年戰爭」意指什麼？日本如何思索「日本殖民統治對韓國的責任」以及「十五年戰爭」與殖民統治的關連？

他們批評十五年戰爭的概念是以中國和美國為中心的歷史觀，忽略早期對韓國的殖民。從韓國的角度來看，戰爭自1945年8月結束，若始於1875年江華島事件就為70年戰爭，若始於中日戰爭（1894至1895年）就是50年的戰爭，或日俄戰爭（1904-1905）就是40年戰爭。韓國學者認為，所謂「戰爭」並非限於連續作戰的時間。

韓國對戰爭的概念化，對日本歷史學家提出重要的問題。日本歷史學家不熟悉「日-韓50年戰爭」或「日-韓40年戰爭」的概念。當日本歷史學家提到為「戰爭」負責，他們假定是十五年戰爭（即主要是與中國的戰爭），此外，他們還沒有充分審視（examined）韓國的殖民統治和十五年戰爭之間的關係。

認真看待朝鮮問題，需要日本歷史學家重新審視對過去戰爭現有的整體研究架構。這可能是日本學者與韓國學者需要在相同的說法上進行研究和討論的問題。雖然近年來日本教科書已經允許更多的空間討論日本侵略朝鮮及其殖民統治，但沒有教科書作出回應或從這個觀點書寫。

在研究團隊中，Pak Song-su（韓國研究學會），指出日本教科書中還保有日本帝國的舊觀念，日本「吞併」韓國為了發展韓國的文明和保護韓國以免受俄國殖民，日本是促進韓國的現代化，教科書中對韓國的描述，扭曲的圖像仍然植入日本學生的心智中。

和解與新問題：該項研究團隊的成就與未來的任務

研究團隊在1993年3月解散，會員轉移至個別更深入地交換意見。該研究團隊有其價值，並提出許多問題，其中有些是得不到解決。

#### 1. 實際閱讀教科書

最顯著的成就是透過日本和韓國雙邊的觀點，有機會研究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目前，韓國和日本有幾種教育交流路線，但這些交流主要用於研究目的。還沒有群體針對特定的教科書一起逐行檢視（line-by-line）。日本史學家和教育家應有聽更多的批評準備，基於接近實際文本的閱讀，且以嚴肅和真誠的態度，應對這些批評。

#### 2. 需要研究韓國的教科書

研究團隊沒有分析韓國的教科書，這個最重要的領域被忽視。自南韓政府於1948年成立以來，韓國歷史教科書根據國定課程綱要已經改變六次。前兩次綱要，1954年和1963年，都在李承晚總統的政府治理的影響下書寫，且一些現有的教科書仍保留一些主題，這一時期的指導原則是「反共」和「反日」。1973年，

啟動第三次修訂，朴正熙總統提出了「民族主義的教育」，賦予國家負責編寫歷史教科書（此一系統持續至今）。在此期間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指出，日本的侵略是干擾韓國自主發展的重大歷史因素。

第四次的課程綱要，於1981年通過的，強調韓國儘管受到日本的侵略和殖民，自力更生的發展。描述韓國現代史是反封建，反殖民主義，並在日本統治下為求獨立的抗日戰爭。在1987年的第五次課程綱要，韓國現代史描述一個政治、經濟和思想領域「自主發展」的年代，在這一版的教科書大力推廣韓國民族主義，且日本侵略的意義被淡化和抗日聲音明顯減少。

第六課程綱要在1997年3月生效，和第七次綱要，預計於2001年，目前正在開發中。作者雖還沒有分析1997年課程綱要下的教科書，但他認為現在一般韓國教科書強調國家的自主發展和淡化日本侵略和統治的影響。韓國教科書強調爭取獨立的努力，而不是經驗被壓迫，但這不意味入侵的歷史和日本壓迫被遺忘。

### 3. 韓國-日本共同教科書可能嗎？

研究團隊並沒有解決，是否有可能創造一個「共同的日本-韓國的教科書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韓國學者有分歧，Pak Sungsoo堅持有必要創造一個共同的教科書（用他的話說，它是值得追求的，即使需要百年的發展），但Yi Won-sun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許多日本與會者與Yi的觀點，認為教科書制度間許多體制、歷史教科書組織的差異，以及最重要的，這兩個國家學者和人民之間歷史解釋的分歧。

作者認為就目前來說一個共同的教科書不可能的，有幾個原因。首先，日本和韓國的歷史教科書，在知識組織和主題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歷史教科書中，韓國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外交歷史脈絡中被討論。分析日本的現代外交史，一般首先著重於日本與歐洲和美國的關係，再者是中國，最後是韓國。在韓國歷史教科書，韓國與日本的關係是核心。（在教科書中抗日文學和抗日音樂是一例）韓國現代史教科書不可能不寫入日本。一個共同的韓國日本的教科書似乎沒有簡單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分歧。

第二個原因涉及到在日本和韓國教科書的生產系統。日本採用的是國家制度的篩選和認證，並已生產約二十本歷史教科書；另一方面，韓國，採用的是單獨由國家撰寫歷史教科書。

第三個原因，是因為這兩個國家對研究有不同的方法和作法（approaches）。雖然通過學術交流這些差異它有可能會克服，這需要時間來彌補落差。

最後作者認為，試圖建立一個共同的教科書和對現有歷史教科書內容的研究是兩個獨立的項目。共同的討論也給了今後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一個更清晰的任務意義。因此，共同分析這兩個國家的教科書應該繼續下去，選擇共同的主題進行研究，加深韓國和日本人民之間的理解。

## 6. 篇名：德國教科書中的認同與跨國主義 (Identity and transnationalization in German school textbooks)

Yasemin Nuhoglu Soysal (Essex University 社會學教授)

在最近幾十年裡，作者觀察到在回應全球和區域政治上的重新配置，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有顯著變化。如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是一跨國政治實體，在國家的集體性和國家文化正逐漸受到侵蝕的情況下，集體認同和公民素養 (由歷史上國家疆界所形成的) 會發生什麼變化？

德國在社會科教科書的重點放在全球化和多元的世界，這與傳統國家認同的呈現不同，鑑於其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過去，德國沒有選擇，只能在一體化的歐洲和跨國的脈絡定位其身份認同。除此之外。作者主張，還需考慮其他決定性因素，以瞭解戰後德意志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轉變的謎疑。

德國在公共領域中對歷史和國家的定義爭論不斷。80年代中期開始，保守派重新解釋甚至否認大屠殺，這種觀點，一直受到人道主義者和左傾歷史學家的激烈反對，德國的憲法法院裁定，否認大屠殺是違憲的。儘管如此，歷史和民族認同，還有納粹的復興，大屠殺修正主義，反移民暴力事件仍是爭議問題，不斷從德國社會階層浮出水面。

雖然在德國歷史和認同在公共領域有爭議產生，學校課程和教科書似乎不那麼受這些爭議影響。教科書反而反映一種在譴責過去的納粹，及排除涉及「德意志民族過去的輝煌和權力」的敘述。公眾對教科書的論爭明顯較少，這與日本 (還有美國) 是鮮明的對比，作者在這篇文章試圖解開為什麼。她建議，需考慮到 (1) 德國的特定機構 (2) 國際機構與國際行動者參與，及 (3) 歐洲在整合過程的角色。

### 跨國化的教育內容和國家準則的正常化

隨著歐洲成為一個跨國政治實體，主權日益在歐盟民族國家與個人之間共享，可以觀察到歐洲面向 (European dimension) 滲透至國民教育中。學校課程越來越重視廣泛的歐洲理念和公民傳統 (可廣義定義為民主的原則，社會公正和人權)，取代了國族主義的內容和教育國族化 (nationalizing) 的使命。德國許多州的學校課程中所有學科包含四個面向：環境，性別平等，跨文化教育，和歐洲面向。即使是在典型較保守狀態的巴伐利亞，歐洲、民主、人權及區域性的主題也被賦予較高的優先性。

作者訪問了許多政府官員、教育者、教師協會的負責人，他們分享對學校課程逐漸重視歐洲觀點的看法，如認為這個改變是「回應德國、歐洲和全世界的科技、經濟、和政治發展」、「你不可能宣揚歐盟，同時教科書仍是國族主義觀點」，德國教師協會也提到歷史教學的轉變：

越來越強調什麼對歐洲是重要的。例如，教到中世紀的城鎮和城市，舊教材會說關於德國老城鎮，或這些城鎮是典型的德國特色，「啊！你看在波蘭跟德國

有相同的建築物，因此這些建築是德國人建造的。」而現在，不學習德國這些城鎮的特色，而是歐洲的特色。例如，波蘭建築物很像德國的建築物，老師會說「這兩個國家在這一時期，人們建立類似建築物。」這是一個觀點的問題，同樣的材料，你可以從國家的角度或從歐洲的角度來看。在教科書中歐洲的觀點越來越被強調。

### 國家認同的強調

在歐盟國家內，對歐化的回應，各個國家有不同立場。德國的教育、課程更朝向跨國化和多樣化集體認同。在舊的歐洲國家核心，如英國和法國等，透過強調他們的民族特性，對歐洲的入侵有所保留。例如，1988年英國教育改革法案，意在制度化「國定課程」，更加重視國家的歷史和英國文學。歐洲聯盟日益增長也意味著英國可能喪失身份和主權。所以英國的情況下，國定課程是重要的一步。在新課程，英國史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占歷史教學時間的75%。這個比例與德國相比是非常高，德國的歐洲面向和世界史的授課時間與國家史較為相當。

因為與其他歐洲國家的教科書相比，近代史在德國教科書佔有更重要地位。古代史和中世紀史是相對邊緣化。這種不相稱的關注當代歷史，由於其爭議性本質—使得它難以歌頌德意志民族豐功偉業的論述。

### 闡釋戰後德國教科書的趨勢

作者提供三個解釋因素來說明德國教科書中的跨國面向。首先，在戰後時期德國有清楚的認同態勢。另外兩個關注教育的制度性結構和參與教科書和課程生產的行動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過程（經濟和政治）作為處理其挫敗和恢復國家主權的可能方式，所以德國民族國家身份是在歐洲的一體化下發展，德國採取合作的態度，嵌入至更大的統整計畫，去處理認同及與鄰國的關係。而在亞洲各國內部和外部的安全是政府的勢力範圍，因此國家疆界和身份會更加凸顯，如日本，設法從這些壓力中保護自己，並抵制鄰國要求合作重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歷史。在1997年8月，日本政府拒絕韓國的提案，成立日本，德國，波蘭和韓國聯合歷史教科書委員會。

另一個解釋的因素是德國教育系統結構的特點。在德國，學院，學校系統與出版業之間存在緊密的網絡。教育主管部門和其他利益團體—商業協會、教師工會、教師組織、家長協會、大學等緊密聯結，形成強大的共識在發展課程和生產教科書上。最後，德國機構和組織特別活躍，大多是非政府組織，國際間和跨國的努力，如Georg-Eckert國際教科書研究中心，一直致力於歐洲的教學，環境教育，人權和多元文化社會的主題，融入至德國各州的課程中。

讀後省思：

這一卷期的主軸是談教科書國族主義、公民素養與戰爭，附標是比較觀點，但其實焦點比較放在日本的教科書議題，比較的意味比較淡，4篇有關日本專論的文章，收錄的均是傾左的看法，不過還是有其價值，從不同的觀點（理念背景、回歸日本、消費觀點、教科書訴訟案件）來理解當時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教科書編纂會的崛起。這卷期可以說是回應了日本對二戰以來教科書書寫的持續性爭議。

期刊年代為1998年，有趣的是，2001年初，日本政府在其教科書審定上再次面臨國外和國內的壓力，這次的不同是，文部省被要求不要批准新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所生產的教科書，與家永三郎教授的教科書不被文部省批准形成對比。另一方面，從後續事件發展來看，日本最後通過教科書修正主義者或新民族主義者所編纂的教科書（由扶桑社發行），雖然市占率不到百分之一，但已引起廣大的注意與討論，最近（2011）也顯示，日本橫濱、愛媛等地學校採用育鵬社出版的教科書，這股勢力日益擴張。學校教師對這些教科書的觀點，和這些歷史敘事的教科書對學生或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值得關注。

從這幾篇也較可以瞭解德國和日本對二戰的反省是迥然不同，這差異可以追溯到對二次大戰的處理。和平或是友誼的建立，關鍵在於國家間如何瞭解彼此的現狀和歷史，或許如君島教授所建議的，這需要更多的共同研究，透過共同研究能瞭解與理解彼此的看法，或能漸漸縮小歷史認知差距。